

黃克武評：馮 客著《性、文化與現代化：民國時期的醫學與性控制》

書 名：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作 者：Frank Dikötter

出版地：Honolulu

出版者：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出版時間：一九九五

頁 數：二三三

本書作者馮客早年由瑞士日內瓦大學畢業，專攻現代史與俄國文學，後獲得英國倫敦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教於該校亞非學院(SOAS)。他主要的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文化史、思想史，在

醫學史方面用力尤深。馮氏到目前為止撰成二本專書，第一本為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中譯書名《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第二本即是本書；第三本是有關中國的優生學的作品，書名為 *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 (London: Hurst, 1998)。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計劃是有關近代中國犯罪學的研究。(註一)另外還編有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以上馮氏有關近代中國種族、性觀念、優生學、犯罪學等方面的研究表面上看來頗為零散，但實際上彼此之間是相互聯繫的，共同地關注：近代中國科學知識的形成與中西文化、傳統與現代之間交織互動的關係。換言之，他是從文化史的角度探討近代中國的「科學史」，這樣一來「科學」並非源於西方的一種普遍性的「現代知識」，更非探討客觀不變的真理，而是與人們的「建構」(construction)、「想像」(imagination)等聯繫在一起的文化活動。比如說人們對於「生理性」的疾病與健康的界定，以及對生殖等活動的詮釋等，其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文化性」的因素所制約的。

雖然作者沒有明白地表述，但上述文化史的研究視角很明顯地與福柯 (Michel Foucault)、孔恩 (Thomas S. Kuhn) 等人的著作有密切的關係，(註二)而特別表現在作者在方法學方面所謂的 discourse (論述或論域) 的觀念之上。

根據作者的看法 discourse 的研究法有以下幾個特色：第一、它與研究政治事件、社會經濟變

動的歷史不同，但可以互補；（頁一二）第二、它與研究大人物的思想史也有所差異；第三、它依賴「文本」(texts)來作研究，而文本一方面反映環境，另一方面也在環境之中運作；第四、文本之中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聲音(voices)；第五、作者要進一步從不同聲音之中找到超越個人作者所有的「知識與意義的結構」。（頁六一—七）

在《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一書作者研究有關種族的論述；在《性、文化與現代化：民國時期的醫學與性控制》一書他所研究的則是民國時期有關「性」的論述，亦即探討有關性的一種「科學的」知識結構是如何形成的。他把此一論述的創造者稱為「現代化精英」(modernizing elite)，他們包括記者、社會改革家、性教育者、大學教授、政治理論家與文化傳播者等。（頁五）作者強調這一論述是在「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 頁一一)之中形成，而與國家或官方機構的倡導沒有直接的關係。最明顯的例子是在人口政策方面，主流的性論述很強調控制生育、優生學，但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卻基於三民主義，主張增加人口。（頁一一七）

從歷史發展上看，民國時期的性論述是對「儒家論述」(Confucian discourse)的突破，是從儒家「玄學」的宇宙觀（包括以陰陽觀念為基礎的兩性觀）到「科學」的宇宙觀（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自然的」兩性）之演變。另一方面也與一九四九年共產政權建立之後的情況有所不同，一九四九年之後性論述的特色是將性、科學（醫學）與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知識與政治權力之間有直接的關係。（頁六）

作者不但看到歷史的斷裂與發展，也非常強調歷史的連續性。他同意柯文(Paul Cohen)在《

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一書中的看法，避免將「中國」、「西方」以及「傳統」、「現代」視為相對立的概念；同時也要避免薩伊德(Edward Said)所說的「東方主義」的觀點，以西方為中心來扭曲東方，並忽略西方內部的歧異。他所研究的民國時期的性論述即表現出多元、交織的特點，並有不同的來源與互異的發展方向，(頁一二)而不能用單一範疇或中西混雜等概念來描述。例如新論述的形成不但是單純地引進西方的科學，也不能說是西方文化的「衍生物」(derivation, 頁六九)，而是有傳統的背景。早在十七、十八世紀之時中國士人如徐光啟、洪亮吉與汪士鐸的作品之中就已奠立新人口觀的基礎；(註三)在西力衝擊之前中國就有專業化的婦科；(頁一六，在這方面可參考 Charlotte Furth 教授最近出版的 *A Flourishing Yin* 一書。)同時在民國時期，「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之間也沒有清楚的界限。(頁一五七)作者借用人類學家 David Parkin 的話，將這一論述稱為 *lattice knowledge* (格子狀的知識)。總之，運用 *discourse* 的方法，馮客一方面企圖看到複雜多變的思想史、科學史的現象，另一方面則希望掌握變遷底層之中一種不變的知識結構。

本書的主體部分即是描寫與分析民國時期，特別是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社會對於性問題的討論。作者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一現代化的、醫學的、性的論述(他稱之為「相對地整合的網」，或「一個整體」，*a relatively coherent web, a whole*, 頁八)的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s*)是由許多不同的因素所促成的，有個人的因素，也有集體的因素；有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因

素，也有思想的因素：包括個人對性快感的耽溺、對生理現象的認識與解釋、疾病觀、生育觀、家庭結構的異動、教育活動、商業活動（特別是新興的出版、印刷文化，頁四）、城市的生活空間（提供兩性接觸的新場所）、社會階層的變化、新思想觀念的出現（主要有演化論、社會有機體論、國族主義，與科學主義，頁八、一一七），以及更廣的對於「現代性」、「現代文化」的追尋等。

在上述因素的互動之下中國知識界所產生的主要的觀點是：民國時期現代性觀念的形成並不走向個人的解放，性和生育與人口、種族、優生學等觀念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套追求國族富強的思想傾向。作者也隱含地表示這一歷史背景與一九四九年之後極權政府對性與生育（如一胎化、優生等）的控制有某種程度的關連。

他反覆描寫的話語包括：

女人的「性」是依賴的，並對於更直接的而且工具性的男人的「性」的反應，它被建構為一個「母性的本能」，主要是與生育活動連結在一起。（頁六一）

性活動的目的是種族的延續。（頁一一〇）

政治活動不再被視為是公眾或個人道德的結果，人口上的優勢才是決國家強弱的關鍵。（頁一〇八）

周建人以為優生學的原則應該管制人的情愛活動。（頁一一〇）
種族需要改良，才能使中國適應物競天擇的天演界。（頁一〇七）

人類的生育使個人與人口之間建立一個生物學上的聯繫，因而使生育活動必須要因為種族的健康而受到管制。(頁一一七)

青春期的同性戀和手淫類似，被認為是在社會上所學得的惡行，為了自己，為了夫妻關係與國家，這一惡行應由規訓來克服。(頁一四〇—一四二)

手淫影響個人健康，會導致滅種亡國。(頁一六五—一七一)

性病(如梅毒)不僅影響個人與家庭的健康，也影響種族。因此性、病、集體、未來是相互關連的，國家應教育人民並管制他們的性生活。(頁一二二、一二六—一三〇)
性從來不曾與生育切斷聯繫。(頁一三八、一八五)

本書文字流暢、論證明晰、論點新穎，對這一課題有「性」趣的讀者來說，是一本絕對不宜錯過的好書。尤其重要的是在他的分析、解剖之下，我們常常視為理所當然的一些詞彙如「婦女」、「青年」、「疾病」(無論是精神性的「歇斯特里亞」hysteria 或官能性的梅毒)、「健康」、「人口」、「種族」等，都有新的一層意義，它們不再是客觀、中立、透明的概念，而是在歷史過程之中逐漸地被建構出來，並帶有深刻的文化意涵。總之，以文化史的角度來研究思想史、科學史的處理手法在本書之中表達得淋漓盡致，順此方向思考可以開展出許多新的研究課題。除此之外該書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一、方法學方面：評者以為作者所採用的 *discourse* 研究法與中西之間的對比法，在處理此一課題之時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例如作者不但探討文本所代表的不同聲音；更挖掘不同聲音所共

同具有的預設，這樣的處理方式與拙著對於思想史方法論的想法頗為配合。（註四）再者，作者所作的比較常常能突顯出對比雙方的特點，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例如作者指出中國與西方都有優生學，但是民國時期與西方不同之處是沒有立法，因而不對人民生活產生法律性的管束，這與納粹時代的德國政府對猶太人、吉普賽人、殘障、同性戀的政策性的迫害有所不同。（頁一一六）總之，在方法學方面，作者一方面表現出深厚的理論根基，卻又避免艱澀、抽象的討論、或引用意義不明的詞彙，而能將此方法熟稔地運用在處理中國問題之上。

二、材料運用的廣泛：該書所分析民國時期的出版物超過三五〇種，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東方雜誌》、《婦女雜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China Medical Journal*之外，更運用各種手冊、指引、教科書、科普書刊等非常罕見的出版品，這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在內容方面，作者不但引用文字性的論述，也徵引重要的圖表，使讀者產生深刻的印象。同時作者對於西方學界，尤其是英文、法文的相關研究也很熟悉，註解之中常常可以看到很有用的書目。

評者也以為本書有一部分的觀點可以商榷。其中最值得討論的一個主張是作者認為民國時期性論述與救亡的要求結合在一起，所以性與生育、優生等觀念不曾有所分離，性的目的是強種強國，因而是需要控制的。換言之，性論述之中性只是達成國家富強的方法；而不把個人在性方面的快樂，與個人的表達當作一個終極目的。

作者上述的分析雖然是以民國時期的性論述作為對象，但這種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觀察其實是一個很多人曾提過的觀點。茲舉二例，一是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對嚴復的研究，一是李澤

厚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在史氏的書中，他將嚴復描寫為主要受到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驅策，景仰西方文化中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精神所代表的動力(Faustian-Promethean nat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dynamism)，因此對嚴復來說，他在引介約翰彌爾那樣的「西方自由主義」之時，並不重視個人自由價值在本質上的意義，而強調它對國家富強的貢獻。有些人並進一步地認為這樣的思想傾向因而成為後來集體主義的源頭。(註五)史華慈的想法和李澤厚對五四以來對中國思想界的觀察是相互配合的，李氏以為五四時期中國思想家提出種種追求個體自由與個性解放的「啟蒙」理想，並以為啟蒙與救亡是「並行不悖相得益彰」，但是這樣的局面「並沒有延續多久，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鬥爭，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全面壓倒了思想啟蒙的主題」。(註六)

馮客的論點顯然與史華慈和李澤厚的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個人自由、個體意識、個性解放的解釋可否立足呢？救亡真的壓倒了啟蒙嗎？我認為這一想法非常值得懷疑。近年來史、李二人的觀點已受到學界的修正，有一些學者開始了解到近代中國思想界並不完全將個人自由視為是達成國家富強的方法。例如拙著《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針對史華慈的觀點提出反駁，認為嚴復對個人自由有本質上的尊重，對他來說個人自由不可化約為國家富強的工具：

嚴復在譯介西方文化之時，充分地認識到個人價值在本質上的意義，他並不將個人視為是達成到其他目的的手段；然而此種對個人的肯定與英國自由主義者彌爾強調個人自由之重

要性的方式並不完全相同。如果我們說彌爾對個人的重視是奠基於「己重群輕」的西方個人主義之上的話，嚴復並沒有這樣的看法。更何況……嚴復對彌爾的個人主義有不少的誤解。所以嚴復與彌爾對個人的看法不相同，但是兩人都以為個人具有莫大的重要性與崇高的價值。嚴復對個人價值的肯定是建立在群己平衡的基礎之上，亦即他所說的「克己自繇二義不可偏廢」。他既沒有將個人置於群體之上，也沒有將群體置於個人之上，而是秉持了一種植根於中國傳統中「成己成物」、「明德新民」之觀念，而有的第三種選擇：個人與群體一樣地重要。對他來說，個人自由與社會利益（即傳統語彙中的群己、公私、利義）可以攜手並進而

不相衝突。（註七）

拙著所要強調的是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誠然是一個強勢的霸權論述，但此一論述並沒有完全的籠罩性，在當時思想界仍有另一個與傳統背景密切相關的，強調個人自由與自我之主體性的聲音。換言之，在眾聲喧嘩之中，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的追求並沒有完全為救亡的吶喊所掩蓋。

性與個人自由和個性解放有直接的關係，近代以來對個人自由的追尋幾乎都伴隨著對性方面的再思考。如果我們以上述拙著有關個人自由的想法來觀察馮客所研究的近代中國的性論述的話，我發現民國時期國人對於性的討論不能描繪成「性與生育一直沒有分開」，或說性一直被認為是達成國家富強的手段，而無本身的價值；反而我們可以找到大量的文本討論個人在性行為之中的歡愉，把性快感的追求當作具有本質性的意義。

張競生的《性史》無疑地是當時性論述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品，這一本書中一方面的確可以

看到像作者所說的，將性與「優種」結合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性也被描寫為是追求「男女彼此心靈上最協洽與和諧……於肉慾中得到心靈的愉快，於心靈中又得到了肉體的滿足」（張競生編後附記）。在該書之中所收的各文，多半也不把性與國家富強或優生強種聯繫在一起，反而非常突出個人在性方面的歡愉，認為這樣的歡愉是「科學的」、「藝術的」與「健康的」。例如在江平所寫的〈初次的性交〉，描寫一個十六歲的男孩與董二嫂之間的性關係（婚外情），他說：

出精的時候，我這是第一次感受著至樂的，神異的境界，這也是第一次嘗著人生的真味。哦！活著原來還有這一種奧妙啊！我對於人生發生了一種新見解，我出神了。

我們便實行了那俗所說的「觀音坐蓮台」法……這一次管是我們性慾的第一次的大滿足。我們覺得我們幸福極了。我們不顧一切，我們根本就忘了一切。的確，這種快樂，連生命犧牲在內，都是可以的。

江平如何來評估他的情人董二嫂呢？他說「她不是一個淫婦……她畢竟不是一個下流的婦人……她把靈魂均勻地放在肉裡面，這樣就是她」。張競生在評論這個故事時也沒有因為這是一個婚外情而大加譴責，他環繞著男女相互調和的問題，說「董二嫂與小江平能互相調和，所以彼此相愛得如膠似漆了」。（註八）總之，在江平與張競生的話語之中我們完全看不到國族主義的影子。（註九）

這樣的論述在《性史》之中非常多，它不但與新的科學論述密切結合，而且與明清以來的情慾文本有很強的連續性。我認為張競生所標舉出對性方面的討論有非常複雜的內涵，如果就其中

群已關係來說，他所企圖塑造的理念雖然包含了馮客所說的將性與優生強種結合為一的看法，但也包括大量將性視為是個體的歡愉、情慾的自主。作者在討論民國時期的性論述之時，如能同時注意到強種與自主兩方面的情況，以及兩者之間相離相合的複雜關係，或許可以展現出一個更為持平的歷史圖像。

最後該書有一些校對或排版上的錯誤，希望再版時能修正：

頁二〇一「顏復」應為「嚴復」；「保種余儀」應為「保種餘義」。

頁二二四「胡嗅」應為「狐（或胡）臭」。

頁二二五「潘公展」的「展」錯誤；「慢性」應為「慢性」；「沈窩淇」的「窩」似有誤。

頁二二六「腋嗅」為「腋臭」；「顏復」為「嚴復」。

註 釋

註一：這是馮客先生於一九九六年至本所訪問時所擬定的課題。其實在《性、文化與現代化》一書中他已經注意到這一個題目，在頁四一他提到義大利犯罪學者 Cesare Lombroso 有關性別差異與犯罪的學說對國人的影響；而周光琦在一九四六年著有《性與犯罪》一書。

註二：在這裡我特別指 Foucault 的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與 Kuhn 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註三：作者對汪士鐸的討論非常精采（頁一〇六一—一〇七），他在十九世紀中期就提出與後來優生學很類似的觀點。

註四：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四），頁三七—三九。

註五：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64])。學界有關清末思想與後來集體主義的淵源之討論請參考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二四。

註六：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一九九一），頁二九。

註七：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臺北：允晨出版社，一九九八），頁三一—四。

註八：張競生，〈性史〉（出版時地不詳），頁三七、四四—四五、五九、六〇。最近廣州出版社出版了《張競生文集》（廣州：廣州出版社，一九九八），上下卷，將張氏所編、寫的主要作品都收羅在一起，在運用上更為方便。

註九：彭小妍對張競生的看法與我的觀察是一致的，她引用張氏在《新文化》中所寫的〈新淫義與真科學〉與《美的社會組織法》上的論點指出「這不正是聲明，婚姻與性是兩回事？只要有愛情，婚外的性也是正

常的；沒有愛情的婚姻關係下，性無異於賣淫」，見氏著：〈五四的「新性道德」：女性情慾論述與建構民族國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三期（一九九五），頁八七。